



英烈頌

第一集

重慶出版社



2 032 4256 1

英 烈 颂

第 一 集

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编委会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组稿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封面雕塑 叶毓山
封面设计 郭锡能
责任编辑 周西平

英 烈 颂 (第一集)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万 县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36千
1982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600

书号: 11114·14 定价: 0.62 元

出版说明

《英烈颂》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组稿，“重庆市现代革命史丛书编委会”审定、编辑的一套丛书。

由于烈士多，调查、整理等工作量大，编写、审定和完稿的时间有先有后，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采取了集中一批，分集出版的作法，对其中内容较多，分量较大的，则出单行本，如《江竹筠传》等。

这套丛书，介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后来的四川省委领导下，许多中共党员和党外革命志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为争取抗战胜利，社会解放，历经艰辛，英勇奋斗的革命事迹。特别是他们被敌人逮捕，身经残酷折磨，面对死亡威胁，而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不仅应当载入我党史册，而且对今天的青少年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使他们了解革命先辈是怎样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斗争，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和代价，从而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

编写和出版革命先烈事迹，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非常严肃、艰巨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在工作中出现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了解当时斗争情况的同志多提意见，给我们以帮助和指正。

目 录

愿以我血献后土

——车耀先烈士传略……………沈寄踪 钟永玉(1)

向往新生梦北疆

——许晓轩烈士传略……………冯开文(30)

陈作仪烈士传……………王 庸(51)

蒋可然烈士传……………李一平 张廷钰(68)

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

——黄绍辉烈士传略……………戚 雷(85)

杨汉秀烈士传……………甘 犁(101)

蔡梦慰烈士传略……………邓又萍(123)

真理的信徒 人民的歌手

——古承铄烈士传略……………梁 余(139)

一颗永不失味的盐

——陈丹墀烈士小传……………陈 亮(156)

马秀英烈士传……………王宗力(167)

何雪松烈士传……………冯开文(174)

叶正邦烈士传略……………王宗力(191)

程谦谋烈士传……………谭正威 程济志(199)

愿以我血献后土

——车耀先烈士传略

沈寄踪 钟永玉



—

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这几首诗，是车耀先烈士在黑暗的旧中国，为了救国救民，不断探索革命真理的总结。他通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并为之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车耀先于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1894年）旧历8月28日出生在四川大邑县灌口场的一个小商贩家里，小时名车荣华。他的母亲性格倔强，和祖母不能相处，回到灌口场娘家，自己开了一家糖食铺。车耀先和哥哥跟着母亲、外祖母过活。他的父亲住在离场五里的乡下，帮人背运茶叶、煤炭，有时从成都买回一些旧衣服在场上摆地摊出售。

车耀先五岁时进私塾读书，断断续续读了二年多。没学到什么东西，却挨了不少板子，常常被打得到处是伤。后来他的家庭由于债务纠纷打官司，在层层敲诈勒索下，被搞得倾家荡产，车耀先也由此中途辍学了。

日子很艰难，十一、二岁的车耀先便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担子。他用少得可怜的本钱从二十里外的县城买回两大封火柴，赶场发卖。卖完再去贩运。附近几个乡场，相距二、三十里，每天赶一个场，来回奔波四、五十里，天不见亮就出去，天黑了才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回来，坐在炉子旁边，顾不得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就打起瞌睡来。等不得天亮，又要起身，开始一天的奔波。

有一次涉水过河，他又累又饿，两腿支持不住，一下栽倒了。急流把他冲了好远，几乎淹死。有一次，他帮人背一捆布，哪知越背越重，走了几里路，实在背不动了，无可奈何，向布贩说了不少好话，倒赔了五文铜钱才算了事。

从十一、二岁到十四岁，车耀先就是这样度过艰难的岁月。他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在这奔波劳碌的三年当中，受了不少汕笑和欺凌，指责和痛骂。没有人同情我，也无人怜惜过我。听其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儿童挣扎在饥饿线上。死也、活也、凭自己的命运去闯。纵不想它，也不会忘它。”

（引自车耀先狱中给子女的遗书）

童年的艰苦生活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同时也使他深深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痛苦。

1908年，车耀先刚满十四岁，县城一位发售火柴的商人见他诚实可靠，介绍他到崇庆州“益盛荣”商号当学徒。这家商号经销火柴，兼营银钱掉换。离商号不远有一家书铺，车耀先时常从那里租些小说回来，一有空就看。老板的五叔胡价人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看到这个小学徒居然如此喜欢读书，实在难得，便把他当作弟子，不时加以指点。于是识字读书就成了他每天晚上的功课，《三国》、《列国》、《聊斋》、《西厢》成了他受教的课本。他在崇庆的四年中读了几十部小说和历史书籍，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发动罢市、罢课。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组织“同志军”，反抗清朝政府。崇庆州在七月初宣布罢市，车耀先随着胡价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八月初，一支“同志军”开进了崇庆城，把人民痛恨的警察头子“斌太爷”抓来砍头示众。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这件事给车耀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车耀先三年学徒期满出师后，被留在商号当“先生”，每年工钱十二串。但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暴之后，他已不甘于商号的平庸生活了，觉得长此下去没有什么出路。这时，胡价人已到“同志军”改编的川军二师八团工作。曾经为民除害的同志军对车耀先是很有吸引力的。于是他下决心弃商从军。

二

1912年，未满十八岁的车耀先投进川军。当时胡价人在连里当司书，因为眼睛不好，写字吃力，把车耀先留在连里帮他抄写公文表册。第二年，胡价人被淘汰解职回家。车耀先便下连当兵。他决心“在奋斗中求出路”。每日勤学苦练。一月后由二等兵升为一等兵，半年后经过考试升为下士，一年后当了司务长。

在保路风潮中组织起来的“同志军”，虽然基本上是由自发参加斗争的广大下层群众所组成，但是领导成员大多是“哥老会”（“袍哥”）的首领。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新的封建统治者——军阀、官僚们窃取之后，这些“袍哥”首领大多被腐化、收买了。“同志军”被改编，变成了军阀争权掠地，镇压人民的工具。这个根本性质的变化，当时的车耀先还不可能认识得到。他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军阀们卖命。1918年他升任连长。一次，在陕南镇巴县曾被围二十一天，他以坚守孤城的战功得到了一枚北洋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

车耀先喜欢读书。行军时也带着书籍随时阅读。1922年，他驻军简阳时，常到附近县立中学向老师们请教读书中的疑难问题，认识了在校教书的聂生明。聂生明原在华西大学读书。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在简阳福音堂当教师。他对这位好学深思，热情正直的青年军官十分钦佩，认为“在中国的军人中，车耀先真是鹤立鸡群。”他给车耀先介绍自然科学和文学书籍，也介绍基督教义。车耀先则在经济上帮助他继续上大学读书。1923年，车耀先在简阳附近贾家场的战斗中头部负了重伤，被丢弃在战场上。聂生明把他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护送到成都医治。由于碎骨压伤神经，致使右腿僵直，成为跛足。

“幼年仗剑怀佛心”，车耀先怀着一颗同情人民苦难的“佛心”，却使他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旧军队的生活，使他看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他十分痛心而终于省悟：自己“仗”的原来不是为民除害之“剑”，而是“屠刀”。他出入在枪林弹雨之中不过是为军阀们的私利效力而已。他愤慨地说：“我的腿是为军阀争洋房，小老婆而残废的！”他要“放下屠刀求真神。”可是这救国救民的“真神”在哪里呢？他在风雨如磐的黑夜里上下求索着。

聂生明给他指引的“真神”是基督教，是《新旧约》。也许基督教能减轻人民的苦难吧，他怀着这样一个天真的幻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且在军队里传教。他带的一个团的官兵也都成了基督徒。可是“真神”经不住现实的考验。教会中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凌辱中国人民的行为使他又进一步认识到，什么“博爱”，“平等”，全都是骗人的谎

言。这个“真神”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他失望了。

1925—1927年的大革命风暴给苦闷中的车耀先带来了希望曙光。

当北伐军打到武汉之后，四川军阀迫于形势，假惺惺地表示拥护革命了。1926年12月，川军刘湘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一批政治工作人员，黄埔军校的学生从广州来到刘湘的部队里，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读破新旧约千遍”而未找到出路的车耀先，开始学习共产主义。他明白了“宗教不过欺愚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说：“十六年（1927）的革命思潮，淘尽了我的宗教信仰，社会主义代替了我的圣经。”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成为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真诚拥护者。（当时还有一个国民党右派的“总土地省党部”。）车耀先被任命为改编后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四师十团的国民党（左派）代表。这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重庆附近的白市驿，他积极支持附近农民反抗土豪劣绅和“团阀”的斗争。四师师长罗仪三对车耀先说：“什么打倒土豪劣绅，那些只是宣传嘛，怎么能认真干呢？”但是车耀先却是认真干的。他对于刘湘部队挂起革命军的旗号却保持军阀部队的旧习不改，很不满意，他在会上公开加以指责，因而引起右派军官的不满。不久，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车耀先怒不可遏，却找不到对策。接着“四·一二”“七·一五”，事件发生，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车耀先感到失望和愤慨，借出席“基督教东亚区大

会”的机会离开四川到了上海。

在“基督教东亚区大会”上，车耀先又一次看到控制教会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歧视，他愤而中途退出会场。1928年二月，他由上海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一些展览会上，他看到许多羞辱我国的展品，如北京的城门，康熙的金龙大炮都作为战利品陈列着，还看到黄海海战中被击败的中国北洋舰队的图片，甚至青岛也被当作了日本的海军基地而制成模型公开展览。车耀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伤，他为祖国蒙受的羞辱深感痛心。3月过朝鲜，又亲眼看到了朝鲜人民的亡国之痛。进入我国东北境内，日本侵略者气焰之盛更使他触目惊心。他在日记中写着：从安东到沈阳，从沈阳到大连，“俨然如日本之地然”，鞍山铁矿被“日本人日夜开采，可惜！可惜！沿途仍如日本国内情形然，决不似中国之土地”。……“真如一殖民地然。可悲！可恨！”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东北的“满蒙计划”正在一步一步进行，有强烈爱国心的车耀先怎能不为祖国的前途忧虑啊！5月抵达上海换轮船西上。一路上看见日本、英国、美国军舰“纵横于长江，示威于南京”。他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帝国主义之威风今已尝之矣！想我党军（按指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军）去年到武汉后，其努力如何之大，其威风振撼全球。今反受日本如此之辱。此何故耶？非分共之过耶？”他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疯狂反共，十分痛恨。

这次出游，促进了车耀先思想上的进一步发展。他曾经说过：“十七年（1928）游历日本朝鲜归来，甚觉国事蜩

塘，对于一切均感不满”。他为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而心急如焚。他严肃地思考，认真地阅读革命书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喜见东方瑞气升”，他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车耀先回到四川时，新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刘湘对车耀先早已不大放心，提出保送他进陆军大学深造，或者委派他出任县长。车耀先一一加以拒绝，坚决辞职，弃官为民。他已下定决心，同旧的生活决裂，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三

车耀先是最终找到并坚决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人之一。

1928年冬天。车耀先由重庆回到成都，1929年，他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他投进人民革命的洪流，对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满怀胜利的信心。他写下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庄严誓言。

入党以后，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为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他利用大邑同乡的关系进了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特别班，在二十四军发展党的组织。以后担任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参加了策动1930年10月著名的“广汉暴动”。他还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广泛团结爱国的教徒，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并引导其中一些人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教会势

力集中的成都华西坝修筑围墙，使这个地区成为变相的“租界”。成都人民奋起反抗。车耀先积极参加这次斗争，率领爱国的教徒打着基督教的旗帜示威游行，迫使教会不得不停止筑墙活动。1931年，车耀先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提出“自立”，“自传”，“自养”的口号，以使教会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得到了广大爱国教徒的拥护。

“九·一八”事变以后，车耀先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32年5月9日，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了纪念“五·九”国耻的群众大会，车耀先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怒斥蒋介石对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警闯入会场捕人，车耀先在群众掩护下脱险，随即发动了援救被捕爱国人士的运动。“三军联合办事处”反动头子向传义密令城防部队于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所派之部队为廿四军冷寅东师陈拙修团。冷，陈均为车耀先同乡友好。车耀先得到陈的通知后避往冷寅东公馆，次日凌晨即由冷派汽车送车耀先赴重庆转往上海。半年后，车耀先重返成都，但已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后，他先后在刘文辉的廿四军和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担任上校参谋，副官长以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务。在那最黑暗的年代，他利用这些职务的掩护，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上层人物中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1933年，他从冷寅东处获得搜捕地下党的黑名单，当即多方设法通知黑名单上的同志转移，为保护革命力量作了很大努力。

在这期间，他还在基督教会，世界语学会，注音符号促进会等社会团体中积极活动，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担

任“注音符号促进会”常务理事，于1935年出版了《语言》杂志。他写了许多宣传汉字改革的文章。他设计了一套成都话拼音方案，并使用注音符号亲自教“努力餐”馆的工友们识字读书。他通过学术性的文章传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思想。他在《实施民众教育的两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扫除文盲方案》便一钱不值。而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国内外重重压迫的现实情况之下，是没有解决可能的。

1934年以后，车耀先在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省立女师校任“国音”（注音符号）教员。他还主办了几期以小学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注音符号传习班”。他通过讲课和课后谈话，给学生讲解时事，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启发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为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有的后来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他一点一滴地积聚着革命力量。

四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1935年8月1日，我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四川党的组织虽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损失殆尽，但是有一些地下党员在和党组织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分别进行活

动。车耀先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党的号召和新的政策，便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四川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0月18日，车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联合成都四十几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三百多人参加的发起人大会。临开会时，警备司令部派人前来制止，车耀先晓以民族大义，并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直接交涉，获准开会半小时。车耀先代表发起人向大会作报告，痛陈民族危机，声泪俱下。群情激愤，一致决议在一周内正式成立“救亡联合会”。这次大会有如一声惊雷，打破了笼罩着古城成都的沉默死寂空气。国民党省党部又恨又怕，力图缩小其影响，下令封锁消息，扣发各报刊的有关报道。车耀先打算以“救亡联合会”名义刊登启事，也被禁止了。事实真相被封锁。直到10月24日，报上才登出了一条取缔“救亡联合会”的新闻：

“省党部以其既未立案擅行集会，难免无其它企图。电呈中央请示办法，复电饬转知地方当局取缔”。

什么“难免无！”不过是秦桧“莫须有”的翻版。车耀先强压住满腔怒火，以锋利之笔写了一篇《发起救亡会的经过》，刊登在11月出版的《活路旬刊》和《语言》杂志上，他愤慨地写道：“我们以为世界上最正大的事业，就是爱国救亡……立志救亡固不敢作“传谕嘉奖”之想，而赤心不致有“其它企图”之嫌。……不然，爱国者变为犯法人，国事尚堪问耶？国亡尚有日耶”？

同时，他还在《语言》杂志上刊登了《救亡联合会经过

纪实》的新闻特写，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谎言。

“救亡联合会”虽然被取缔了，车耀先却没有停止抗日救亡活动。他积极支持和帮助出版《活路旬刊》。这是由韩天石、王广义、胡绩伟、周海文等办的救亡刊物。车耀先在“努力餐”楼上自己的住房中腾出一间房子给《活路旬刊》编辑部使用，并在编辑方针、稿件选择、版面设计等方面给予帮助。《活路旬刊》在1936年11月初创刊，出了三期便被迫停刊。于是车耀先决定自己出面办一个刊物，让《活路旬刊》中的一群青年转移到新的阵地上来。他在《答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过这件事的经过：

“十一月本市即有几个青年办的《活路旬刊》出现，我竭力扶助，期为民众喉舌。殊案未立准即有查封之谣……这些热血爱国青年，既不准他们起而行，又不许他们坐而言，我们稍有良心血性的人，还能忍视下去么？我才愤然作个呈文，中有站在民众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识，拥护中央抗战救亡。大声疾呼，唤起民众等语……”这便是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大声周刊》。

正当车耀先着手筹备《大声周刊》的时候，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报刊大肆造谣诬蔑，发出一片“平叛”、“讨伐”的鼓噪。由于国民党封锁事实真象，散布谣言，广大群众认识不清，即使在进步青年中，思想也相当混乱。车耀先每天晚上，用他那台半旧的收音机收听西安电台的广播，并且记录下来。为了把“西安事变”的真象及我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诉群众，揭穿国民党的欺